

雄国。”

1865年，薛福成在《上曾侯相书》中也主张以俄国为例，派人出洋学习：“仿俄人国子监读书之例，招后生之敏慧者，裨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出者，族以爵赏。”<sup>[1]</sup>李鸿章亦有派遣留学生之意，1866年总理衙门奕訢就曾与李鸿章密商派旗兵去外国学习机械制造之事。李鸿章说，派人出国学习“以理与势观之，亦为将来必有之举，鸿章盖尝默存此见未敢倡为是论”，“窃谓此事若行，似不至于流弊太多”<sup>[2]</sup>。但他认为“今日讲求制造，亦不出二途：一则派人前往从学，一则开局延请教师”，主张先“设局学习，稍有所得，不妨派人前往国外一为考验”。<sup>[3]</sup>

尽管这种呼声很微弱，持此想法的人凤毛麟角，但它毕竟是首次在中国提出这个大胆的想法，为幼童留美的实施在思想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留美计划付诸实施与清廷较早前派出的两大官方使团也有很大关系。1866年，经英国人赫德建议，清政府派斌春父子率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赴“泰西”游历。使团遍访英国、法国、荷兰、普鲁士、丹麦等十一个国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大开眼界。1867年，“蒲安臣使团”紧随其后，访问欧美各国，并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即《蒲安臣条约》）。其中第七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sup>[4]</sup>这两次出行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世界并不遥远，对西方文明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蒲安臣条约》为清廷选派留学生远赴美国学习提供了可能。

留美幼童70年代得以成行，起到最直接作用的当属容闳。近代学者舒新城说：“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sup>[5]</sup>

### 一、容闳——中国官费留学之父

留美的实施为容闳个人的计划与洋务派的意识相结合的产物。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即公元1872年8月11日，30名9岁至15岁的少年自上海起航，驶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其后清政府又于1873—1875年接连着派出三批，每批30名，计120名留学生，开始了他们计划长达6~9年的留学生活，这就是近代中国首批官派赴美留学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幼童留美作为中国近代留学

[1] 薛福成.薛福成选集(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23页。

[2] 李鸿章.致总署函[A].海防档.机器局(二)[M].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57,第13页。

[3] 李鸿章.致总署函[A].海防档.机器局(二)[M].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57,第1820页。

[4] 黄月坡等.中外条约汇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第131页。

[5]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台北:台湾中国出版社,1973,第12页。

教育的发端,是洋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之事被洋务大臣曾国藩、李鸿章誉为“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sup>[1]</sup>

孩子们的悲欢离合,与一位荒原中的拓路人、惊涛里最早的远航者紧密相连,这个人就是倡导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容闳(Yung Wing)。正是他的留学教育思想启动了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幼童赴美计划的形成与实施,渗透着容闳毕生的心血,凝聚着他强烈的爱国愿望。

### (一) 远涉重洋,汲取文明

容闳,原名光耀,号纯甫,1828年11月17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西南菠萝岛南屏乡,与被葡萄牙殖民者侵占的澳门仅一水之隔。特殊的地理因素使得香山人与西方人有长时间往来,在闭关锁国的年代,香山曾一度成为当时对外开放的窗子。

1835年,7岁的容闳随父亲到澳门,经父亲的朋友介绍,进入英国传教士郭实腊夫人创设的西塾学习。后来,郭实腊夫人的西塾因故停办了,容闳一度失学在家。1839年11月,澳门的传教士为纪念英国传道会教士马礼逊,创办了马礼逊学堂,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布朗博士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1841年,容闳进该校学习。此时,全校仅有6名学生。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把香港割让给英国,马礼逊学校也迁至香港,加以扩展后,学生增至四十余人。马礼逊学堂是向近代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教会学校。

1841—1846年,容闳一直就读马礼逊学堂,直到1846年,校长因健康缘故决定暂时回美国,临行前他郑重地向全体学生宣布:“此次归国,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诸生中如有愿意同行者,可即起立。”<sup>[2]</sup>容闳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愿意赴美。

赴美国留学是容闳人生关隘的第一次选择。当时中国的国门刚刚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国人对海外世界茫然而又感到恐惧。传闻中,海外蛮夷遍地,中国小孩去后,“红毛人”会将他们开膛剖肚,挖眼掏心。所以在机遇来临的时候,容闳能够紧紧地抓住,由此开始远渡重洋,去异域求学实属不易。容闳之所以能够先他人做出这一选择,主要因为他身上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太多的负累。容闳自小在西塾学习,长期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疏离和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使他渴望从西方学术中汲取精神食粮,形成了与那些走“科甲正途”之路的传统中国士人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格。

### (二) 异域求学,心系故土

1847年1月4日,容闳三人乘坐纽约奥利芬特兄弟公司来华运茶的“亨特利思号”商船,由广州黄埔港起航,驶往美国。时值寒冬,风狂浪猛,旅途之苦自不待言,然而19岁的容闳精力充沛,好奇心强,把海上的困苦颠簸视为“不世之奇观”。98天之后,他们

[1] 李鸿章.奏选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A].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871页。

[2] 容闳.西学东渐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Z].长沙:岳麓书社,1985,第49页。

抵达纽约。

抵美后，容闳即被送往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美国那时尚无高中，仅有为投考大学而设置的预备学校，孟松学校就是这种预备学校。两年过去了，容闳想要继续深造，于是向布朗先生求助。布朗先生找到孟松学校的校董，校董同意资助容闳入大学，但附带一个条件即学成回国必须充当传教士，然而校董得到容闳的回答却是：

子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sup>[1]</sup>

放弃教会的资助，是容闳人生关隘的第二次选择。容闳决心为中国谋福利，不移于贫贱，不淫于富贵。其对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可旌可表。在赴美留学前，容闳尚未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价值标准彼此冲突和对立的环境中，远渡重洋完全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求学志向，但他真正离开祖国之后，才深刻体会到了“两种不同文化在内心相互摩擦的边界”<sup>[2]</sup>。祖国的意识对于在异域留学的容闳来说越来越强烈，所以在留学期间他就把自己与祖国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放弃了填写传教士志愿书，也就放弃了教会的资助。他认为传教不会使中国富强起来，尽管他求学心切，尽管他山穷水尽，然而他以鸿鹄之志报效祖国的愿望却矢志不渝！

人生际会，命运往往难以预料。当容闳拒绝孟松学校校董的资助后，恰逢布朗往美国南部拜访佐治亚州萨伐那妇女协会会员，其间谈及容闳的升学经费问题，未料深得该妇女会员们的同情，慷慨允于资助。经费有了着落，于是容闳在这年夏天考入了耶鲁大学。在耶鲁，他兢兢业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个苦读的中国学生终于读出了好成绩，他两次夺得英文论文竞赛一等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sup>[3]</sup> 1854年，容闳从耶鲁毕业，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容闳既以自己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又以自己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苦恼。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苦恼！放眼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回首祖国，满目疮痍腐败，这使容闳陷入苦闷的思索中：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快快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知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抑也。故予未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

[1]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Z].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第58页.

[2] 许烺光, 徐德隆. 中国人与美国人[M]. 台湾: 巨流出版公司, 1988, 第20页.

[3]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Z].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第60页.

多，而快乐亦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sup>[1]</sup>

发此感慨背后深刻的原因仍然是他的爱国情结。尽管容闳早年因接受西学知识的启迪而率先走出了国门，在美国生活期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不仅剪掉了象征着清国人的长辫子，脱下了中国的长袍马褂，而且在理智上、道义上的观点和一切兴趣爱好都是美国式的，甚至连本国的语言也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从以上种种现象，我们可以说容闳是一个具有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共和思想的中国人。然而他身体里面毕竟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本位文化的潜在影响，使得他在面对祖国被列强侵略和凌辱时，同样会与所有中国人一样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用西方现代文明来拯救贫困落后的旧中国成为他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他在自传中曾写到：

予既远涉重洋，深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sup>[2]</sup>

由此可见，容闳对自己所受的西式教育深信不疑，希望“援西入中”，借此拯救中国，使古老的国家走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在大学期间这种思想已经确立。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成为容闳人生关隘的第三次选择，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回国振兴中国的教育事业。容闳以他的精神和贡献，为“西学东渐”铺下了路基，同时也为中国人在外国树立了名誉。英国人H. N. Shore 1881年在叙述容闳的事迹时写道：“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不会卑贱的……”<sup>[3]</sup>

回顾了容闳留美期间的心路历程，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赠言上那些流露真情的文字，可与之相印证。

有一位名为T. W. Cattin的级友临别赠言说：“亲爱的闳：我深信，当你回到世界彼端你的故乡时，我们在这所大学的结交将融入你的记忆。我向你保证，我决不会忘记我的中国同学，你那深藏内心的热情，对我们文学的癖爱，以及对自己祖国的奉献与深深关切，都早已为我们所习知和感受。……我将企盼获知你在未来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

[1]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Z].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第61页。

[2]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Z].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第62页。

[3]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Z].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第32页。

业。我希望你的伟大计划将会实现……”<sup>[1]</sup>

从赠言中可以得知,容闳虽然是孤身独处异域,但终究是在这样友爱的环境与氛围中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这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他的言行举止或多或少折射在这些潦草零乱的临别赠言之中。读了这些稚嫩然而真诚的言词,我们对容闳回国之后的种种努力,如经商、兴学、变法、革命、流亡,将可增添若干新的诠释。

正是抱着这样一种造福祖国人民的远大理想,1854年11月13日,容闳怀揣羊皮纸制的耶鲁大学毕业文凭,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中国人,从纽约登上了“欧里加号”帆船,踏上了归程。从纽约到香港一路上风狂浪猛,13000海里的航程十分险恶,帆船航行了漫长的154天,像是在昭示着他日后所要经历的种种磨难与艰辛。

### (三)学成回国,效力曾府

容闳归国之际,时值中国战云密布,曾国藩的湘军正在与太平军大肆拼杀,清廷昏庸腐朽,地方官僚暴虐无度。容闳回国后,入世谋生颇为不易,曾做过律师,当过翻译,经过商,数易其职,不时遭受事业的厄运,在当时的中国,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还远不如一名科举出身的小绅士,这让先行者容闳感到醒来的孤苦和郁闷。但是在颠沛流离、风雨飘摇的岁月里,这些见闻与经历始终没有改变他对祖国坚贞不渝的爱,反而更坚定他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以实现其“教育救国”理想的信念。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在国际关系中,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和其他交往中,中国人由于未受过现代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在许多至关重要,原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上,中国被迫运用外国人”<sup>[2]</sup>。容闳开始踏上了为实现他的“留美教育计划”的漫漫之路。

但在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客观现实却与他的“计划”格格不入。绝大多数清朝官吏缺少新知,视学习西方为“以夷变夏”,斥外国的先进技术是“奇技淫巧”,至于派人出国留学,拜洋人做老师,那更是大逆不道,这种状况注定了容闳到处碰壁。

1855年,他在广州找到美国代理驻华公使伯驾,企图通过他结识中国上层官僚,派留学生出国,未果;

同年,容闳又前往香港,希望会见清廷要员,支持其“教育计划”,未果;

1856年,他跑到上海海关,想找到清朝权贵,未果;

1857年,他仍在上海一面译书,一面企图通过一些社会名流去结交清朝重臣,又未果;

1860年,他潜入南京,希望借助太平天国实施其“教育计划”,他谒见了当时在主持天国工作的干王洪仁玕,提出七项建议,希望借天国的力量实现他的教育救国梦,然而太平天国忙于战争,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结果还是失败。容闳只能失望地离开了南京,

[1] 钱刚,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第19页。

[2] 特韦契尔,代跋[A].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1页。

在失望与孤独中度过了三年。

多次失败导致容闳产生通过经商致富,自己出资选派留学生出国的想法,仍未结果。1863年,当他对“留美教育计划”的实施简直有点绝望之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1863年初,容闳忽然收到了张世贵从安庆的来信,张世贵当时在两江总督曾国藩那里当幕僚。曾国藩的湘军1861年9月攻陷安庆,大营就驻扎在那里。曾国藩很重视西方国家制造的枪炮,打算开设机器厂,引进外国设备,制造洋枪大炮。为此,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知识分子,容闳在上海结交的一些朋友,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当时都在安庆曾国藩幕中,他们曾向曾国藩推荐容闳,讲了容闳长期在外国读书的经历。曾国藩闻名后很想一见,特命张世贵写信请容闳到安庆,容闳认为曾在当时功名鼎盛,通过他有利于实现自己回国时所抱的改革中国的教育计划。容闳抵达安庆的第二天,就在安庆大营里面受到了曾国藩的接见,并得到其赏识,进而被招进了其幕府。

当时,曾国藩已经在安庆设立了一个军械所,令华蘅芳、徐寿等试造船炮,这次要容闳来,就是要他参与计议如何扩建一家新式机器厂,容闳提出“以器制器”的主张得到了曾国藩的赞许,两星期后,曾国藩正式任命容闳为出洋委员,派他到国外去购买所需各类机器。尽管容闳对充当这种采买商的角色并不感兴趣,但是为了通过曾国藩帮助他实施其“留美教育计划”,不辞辛苦,毅然受命。机器买回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开业了。容闳替曾国藩解决了一大难题,博得了曾的信任,曾国藩对他表示赞赏和慰勉,命幕僚写了《出洋委员容闳请奖片》上奏,建议授予容闳“五品候补同知”。1865年10月,清政府正式批准了授予容闳五品候补同知官衔,还任命容闳担任江苏省布政司衙门的译员。1867年,容闳建议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附设兵工学校,曾欣然同意。容闳搭上了洋务官僚的大船,从此正式踏入仕途,这使他实现教育救国梦想的路途骤然间缩短了。

在以后的几年中,容闳一直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1868年容闳向好友江苏巡抚丁日昌谈及此事,丁大为赞许,促其“速具详细说帖”,于是,容闳首次将自己的“教育计划”写入《条陈四则》,上奏朝廷: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可分为四批,按年分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总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sup>[1]</sup>

<sup>[1]</sup> [1]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Z]. 长沙:岳麓书社,1985,第122页。

容闳在这里将派留学生的目的、人数、方法、管理、经费等一系列问题都设想到了，这是中国第一个详尽的留学计划，与几年后实行的留美计划在派遣方式、人员规模、选择对象方面相差无几。此条陈由丁日昌寄给协办大学士、户部左侍郎文祥转奏，不料文祥丁忧回籍，条陈石沉大海，使容闳“希望几绝”。

1870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奉调为译员。他借机积极活动，几次鼓动丁日昌去说服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曾国藩终于同意了容闳的主张，并答应立即和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政府旨准。这个留学计划是容闳回国16年遭才有的回应，容闳为了祖国的留学事业奔波16年屡遭挫败却从未改初衷，立愿20年后，才如愿以偿。

为此，容闳“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sup>[1]</sup>。

可以说，派遣留学生虽是洋务运动的客观需要，但容闳所作的个人努力大大缩短了其进程，起到了催生助产的作用。容闳不愧为“中国留学生之父”这一称号。

容闳是中国的哥伦布，因为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待“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看到了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点。公元2000年5月5日，鉴于容闳对中国留学教育和中美交流的贡献，他的肖像进入了耶鲁大学的名人堂，和毕业于该校的政界名人布什、克林顿等一起接受学生的瞻仰。当时，耶鲁大学校长莱文表示，容闳作为第一位在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是耶鲁的骄傲。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称赞容闳是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先锋，是中美两国人民的民间亲善大使，是开启中国现代化的“秘钥”。

## 二、洋务派启动幼童留美破冰之旅

### (一)容闳的留学计划与洋务派西学须“置之庄岳之间”思想的结合

容闳最早倡导幼童留美，多方奔走，殚精竭虑，但他梦想成真的关键还在于搭上了洋务派的这条大船，所以，幼童赴美，虽然容闳功不可没，而“幼童留美”破冰之旅得以起航的关键因素还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僚的努力，特别是在派遣初期，曾国藩曾竭力主持，多方运筹，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了加大赴美留学成行的权重，曾国藩又拉上了李鸿章一同上书给朝廷，李鸿章在派遣过程中的态度也是积极的。

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答应容闳的请求，是其自身的利益与时代结合的产物，具体说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清政府急需一批善于和侵略者打交道的外交人员。洋务派需要留学教育，认为此举“较京、外所设同文馆当有实获”。他

[1]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Z].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第125~126页。